

了。這一過程從一九九〇年代初中國政府發表「中國人權白皮書」後，又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得以實現。二〇〇四年，中國憲法中第一次正式給了「人權」這一概念以法律的地位，並且具體規定了作為平等的人的中國「公民」，都可以且應該受到法律保護的具體的權利內容。

突破了這一政治禁忌之後，二〇〇五年六月，中共中央領導人又進一步提出了超階級的「以人為本」的主張。<sup>[1]</sup> 進而到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和奧運會準備期間，中國政府終於又邁出了正面肯定並承認「人性」觀念的重要一步。在通過歌聲公開認同「人性偉大」的基礎上，中國官方也第一次喊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理想」的口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政府第一次公開宣傳不分階級、民族和國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個夢想。即使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也公開肯定「人性」觀念及其價值，「人性」二字還被寫在了社論的標題上，即本屆奧運「更乾淨更人性更團結」。<sup>[2]</sup>

這也正是為什麼，二〇〇八年奧運會在中國舉辦期間，「人性偉大」四字能夠唱響在依舊紅旗招展的中國大地的原因所在。<sup>[3]</sup>

### 三、歷史研究也是「人學」

何為「人性」，這在學術上仍是一個存在爭議的話題。離開社會性，能否準確說明人性的

價值和意義，也有深入討論的餘地。但是，無視人性和人權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澤東早年的話來講，畢竟「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sup>【四】</sup>。如今，革命改造時代早已過去，官方也刻意不在公開言論，特別是政治宣示中使用階級鬥爭的字眼兒和思維邏輯。公開承認「人性」的超階級性質，主張「以人為本」，這實際上也已經大大突破了毛澤東對「人性」和「愛」的理解。<sup>【五】</sup>在此基礎上，相對而言，圍繞著人性、人權和人道主義問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已經比較容易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了。<sup>【六】</sup>

自古以來，文、史原本就是一家。這是因為，它們都是對人的整體性存在的探求，只不過文學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學、語言和人類既往經驗基礎上的豐富想象，而歷史學則是通過對既

【一】〈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的重要講話〉，載《人民日報》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版。

【二】〈社論：更乾淨更人性更團結的北京奧運〉，載《人民日報》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第一版。

【三】據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Google 中文搜索記錄顯示，「人性偉大」一詞達到三百六十二萬條，「人性」一詞已達到 2730 萬條。

【四】〈毛澤東致和森子升兄並在法諸友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一四八。

【五】參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八五四、八七一—八七二。

【六】林詰：〈人性論、人道主義與人權研究〉，載《法學家》二〇〇六年第六期。

往事件發生發展經過及其原因的發掘與評判，來展現其意義。如果說「文學即人學」，那麼，歷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為研究對象。如果說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話，那麼，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義情懷、無視人的平等和差異的歷史學者，要想通過歷史研究贏得今天社會上多數人，特別是後人的尊重，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歷史需要有人性視角，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馬克思早年形成其理論就是從人道主義的視角觀察人類歷史發展趨向的情況以外，恩格斯對此也有過明白的解釋。他指出，人類對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發出來的。<sup>[1]</sup>英國哲學家沃爾什乾脆認為，歷史學家必須要具備人性觀點，並要基於人性的觀念來做研究。他說：「除了歷史學家各自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們還各有一套基本判斷構成為他們全部思維的基礎。這些判斷關係著人性……歷史學家正是根據他對人性的概念而最終決定把什麼作為事實來加以接受，以及怎樣理解他所確實接受了的東西。」<sup>[2]</sup>

歷史本身是極為複雜和多樣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文化、民族、階級和國家之間，都存在著區別，這些注定了後人對歷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側面，甚至是要從多層面入手的。這意味著，在歷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視角，就認識層面上來看，不過是在歷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個重要的選項而已。它當然會豐富我們對歷史複雜性、多樣性和整體性的認識。

比如，由於科學的過度發展，原本是以複合的有機體整體運行的歷史，如今被人為地碎片化了。太過注重技術手段和學科分類的傾向，把複雜的歷史有機體切割、剝離，使我們幾乎忘記了歷史其實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創造出來的這一事實。顯然，如果我們能夠較多地注意到歷史的主體——人和人的共性，我們也許就能夠擺脫目前流行的這種彌漫著濃烈的福爾馬林氣味的屍體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還原」人的思想、活動及其過程，更容易瞭解人發生這種或那種思想與活動的原因，從而更容易使我們的研究貼近我們研究的對象，即人類歷史的主體——那些曾經也一樣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傳統的革命史觀，著眼於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見階級不見人；新近的現代化史觀，著眼於生產力及其相應的經濟政治發展，又往往見物不見人。流行的階級史觀，或民族國家史觀，著眼於某個階級，或某個民族或國家的發展與命運，往往只見自己不見他人。從人性視角看歷史，就能夠較好地彌補這類史觀的局限性。因為，既然歷史的主體是人，既然人有共有的特性，那麼，研究歷史就不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農民、精英和民眾、敵人和友人、外族和國族、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還必須要注意到他們作為人的共性之所

【一】（德）恩格斯：《反杜林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七（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一〇五。

【二】（英）沃爾什著，何兆武等譯：《歷史哲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六二。

在，並基於對人類共性的理解，透過不同研究對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真切地瞭解歷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圖所在，避免做出過於武斷和片面的判斷。

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例。毛母文氏之愛毛澤東，與蔣母王氏之愛蔣介石，顯然分不出高低貴賤。毛澤東愛其母，與蔣介石愛其母，與他們的黨派立場和階級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關係。舐犢之情、愛子之心，連動物都有，但趨利避害，也是一般動物之本性。何況蔣對蘇俄及共產黨恐懼痛恨幾乎深入骨髓，然而他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在蘇聯加入共青團，歷經階級教育和革命歷煉，並公開發表文章揭露父親虐待母親，譴責其背叛革命，宣佈與蔣斷絕了父子關係，蔣卻不顧兒子忤逆不孝之舉而堅信親情感化之力，堅持爭取兒子回國達十年之久。蔣經國回國後亦在其父的誘導教訓之下迅速轉變，最終接班掌權。此亦足以證明，和階級觀念相比，人性的作用大矣哉。不瞭解這種情況，要讀懂歷史實恐大不易。

#### 四、歷史學家尤其需要「以人為本」

但是，歷史研究者需要講人性、重人道、倡人權，卻並不簡單是因為它能夠在認識方法上提供怎樣的研究便利，而是因為捨此斷難達成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

歷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務在求真，即要儘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相。一般而言，簡單求真並不

難。在各種史料相對完整的情況下，要想通過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實，就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愛好者，也可以實現。今天網上有許多軍事史的愛好者，都沒有專業的背景，然而，他們因為肯下功夫，因此弄清瞭許多部隊的歷史沿革過程，甚至弄清楚瞭不少戰役的具體經過，就是一例。

歷史求真之難，用陳寅恪的說法，主要在兩點。一是難在史料遺存之有限，史家「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二是難在時空環境之隔膜，史家「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才可能獲得對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的「真瞭解」，而「無隔閡膚廓之論」。<sup>[1]</sup>

很顯然，基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治史方法，陳寅恪並不特別擔心現代史家在史料搜集、運用和解讀上不能公正客觀的危險。他更在意的，是史家能否超越時空以及觀念、情感、立場的差異，感同身受地體悟歷史當事各方「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因為這種同情之理解的態度，恰恰才是當今史家能否重建歷史真實的一個重要關鍵所在。

陳寅恪為什麼認為史家可以並且應該做到這一點呢？對此，或許應該提一下德國歷史哲學

【1】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載《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五〇七。

家狄爾泰上個世紀的觀點。他寫道：「歷史世界的第一性的要素就是體驗」，這種主觀的體驗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性不論在任何人身上是存在的。「人類的各種理想、各種生活觀，都發現了這種不可窮盡的人性的某一方面」。而通過史料努力去體驗並理解那些在任何一个時代、任何一個地方都存在的，「活生生的、主動的、具有創造性和回應能力的靈魂」，理應成為史家建構歷史真實的重要方法。<sup>[1]</sup>

陳寅恪在辛亥革命前夕和一九二〇年代初，曾兩度留學德、法，他關於史家應該抱著同情之心，以求理解古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的主張，應該就是在這兩度留學期間所學得的。不論今日史家對從蘭克到狄爾泰所主張的這種方法論有怎樣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我們的史家不能脫離國、族、黨、派及其意識形態的立場，不能基於人性意識，對歷史的參與者，不論「敵」「我」，同樣以客觀中立的態度換位思考，以求瞭解他們「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那麼，所謂還原並重建歷史真實，就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不必說要「發現」什麼「內在的」、「共同的」、「必然的」「歷史規律」了。

據說，作家畢淑敏打過一個比喻，說社會就好比一列火車，大眾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機，自然科學家是技術工，他們的任務就是將載著乘客的列車開到目的地，而人文學者就好比是列車上的觀察員。人文學者的任務就是觀察列車前方可能出現的情況，和關注車廂內乘客的安全與舒適情況，他們對列車是否能夠到達目的地不產生影響，他們的作用是監督乘客乘車的舒適

與否，保證乘客的乘車質量。<sup>[1]</sup>

其實，這個比喻並不恰當。不僅所謂的「大眾」是分層的和有不同的利益需求的，政治家更是會因追逐權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駕駛室的政治家們固然可以主導列車的走向，但維護既得利益的強烈慾望與需要，必定會促使他們無視乘客中眾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體的願望，甚至可能不顧最適合於社會發展的方向，讓列車永遠在他們所希望的軌道上無休止地跑下去。在這方面，單純的自然科學家起不到任何作用。而畢淑敏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她不知道，列車運行不是沒有危險的，不僅司機的作為必須要受到監督和規範，而且列車運行的大方向也必須要有調度室預先設定的干預機制，使必要的干預成為可能，以防止出現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所說的那種自私的「無賴」行為所引發的災難性後果。<sup>[2]</sup>這一切監督、規範和干預機制的設定，都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任務，而且不僅僅是人文學者，政治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教育學家，統統都應該起著這種監督和干預的作用。他們不起作用，社會正

【1】〔德〕威廉·狄爾泰著，胡其鼎譯：《體驗與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三），頁一四四；

〔德〕威廉·狄爾泰著，艾彥譯：《歷史中的意義》（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二〇一三年），頁一一三。

【2】轉見王志耕：〈從「文史不分家」說起〉，學術中華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999>。

【3】大衛·休謨認為，在進行權力機構的體制設計時，必須緊緊盯著人性的弱點，確保從制度上對可能存在的「無賴」進行嚴格的防範。參〔英〕大衛·休謨：《人性論》，頁五七四—五七九。

常運行的干預規範的機制，即從憲法到各種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就沒有可能。人文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在這裡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訴人們，我們過去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道路，為什麼會那樣走，它對在哪裡，錯在哪裡，為什麼必須要有所改變或修正？而沒有這樣的研究和對過去歷史中是非善惡真相的揭示，社會科學工作者就無法找到準確的事實依據對制定各種規範和干預機制提供正確的意見。

歷史研究不僅不是可有可無，而且也不是隨便研究點什麼就有意義。歷史研究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和作用，歷史學者本身必須要有人文關懷和現實關懷，要有大的問題意識，這至為關鍵。而當今時代發展已經越來越清楚地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歷史進步最重要的標誌，不是單純的國家、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個階級或一個族群的自由與解放，而是整個人類和人類社會對人，包括對人的生命，對人性、人道、人權和人的自由與幸福的重視程度得到了怎樣的提升。即由最初的無視到重視，由只重視部分人到重視所有人，由只重視權利的平等到重視每一個人實際的自由感與幸福度。換言之，人類歷史發展和進步的另一種動力，就是人對自身命運的永不休止的關心與關注，也就是人們今天會提出「以人為本」的人性觀念的歷史發展的邏輯所在。

歷史發展當然有其特定的條件，因此條件的不同會令歷史發展不可避免地呈現出階段性和漸進性。在相當長的時段內，人權會被神權所吞噬，一部分人會被另一部分人所統治，普通人

的個人命運會被遮蔽在國家或集體的巨大身形下變得無足輕重。但是，人對自身命運的關心和關注卻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而且永遠也不會止步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有條件參與到關注自身命運的思考中來，故人們要求主宰自己命運的那一天也終會到來。

無論這一過程會經歷怎樣的曲折，無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認識到人性、人道和人權價值的途徑會如何不同，我們都可以斷定，當歷史研究者開始從人性的角度看歷史的時候，他們的研究也就開始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價值了，我們也就開始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了。

（原載《歷史學家茶座》二〇一〇年第二期，收入本書時有文字上的修訂）